

晚唐政治与文学

肖瑞峰 方坚铭 彭万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晚唐政治与文学

肖瑞峰 方坚铭 彭万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唐政治与文学/肖瑞峰、方坚铭、彭万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04 - 9041 - 8

I. ①晚… II. ①肖…②方…③彭… III. ①政治—关系—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691②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2795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季寿荣 郭沂涟
责任校对 刘 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绪论	(1)
■ 第一章 大和年间两次失败的谋剪宦官行动 与时人心态	(16)
第一节 刘蕡对策案和时人心态	(16)
一 刘蕡对策案及其对策之宗旨	(16)
二 时人对刘蕡遭遇的同情	(21)
三 刘蕡思想渊源探析	(23)
第二节 宋申锡冤案与时人心态	(27)
一 宋申锡冤案经过之考察	(28)
二 时人对宋申锡遭遇的同情	(37)
第三节 甘露之变与时人心态	(38)
一 晚唐文士看甘露之变	(39)
二 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	(48)
■ 第二章 牛李党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59)
第一节 牛李党争的演进历程	(59)
一 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 演变	(60)
二 文宗朝的党争状况	(65)

三	从会昌朝至大中朝:党争的深化和 结束	(73)
第二节	牛李党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及 文学创作	(80)
一	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80)
二	晚唐三大诗人与牛李党争	(97)
■	第三章 从懿宗朝至黄巢起义:乱世文士 的政治命运	(125)
第一节	咸通、乾符岁皮、陆的政治命运与 社会批判	(125)
一	皮、陆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	(125)
二	儒学演历史上的皮、陆	(129)
三	皮、陆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批判	(140)
第二节	黄巢起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	(147)
一	黄巢起义始末略	(147)
二	西蜀流亡政府与文士	(154)
三	黄巢起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及其 诗歌创作	(169)
■	第四章 唐王朝的衰亡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192)
第一节	昭宗朝政治事件与文士的政治 命运	(192)
一	韦昭度伐蜀与吴融的幕僚生涯 ..	(193)
二	大顺元年讨伐李克用与文士之立场	(200)
三	乾宁二年三镇兵入京事件与吴融的 诗歌创作	(203)

四	华州播迁与李巨川之阴谋策划	(224)
五	韩偓的政治命运和“诗史”创作	(229)
第二节 唐亡前后文士的政治命运与文学创作		
	创作	(241)
一	那些执著于旧道德的士人,往往是具有节义忠心的士人	(242)
二	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投靠新主,为新主效力的士人	(268)
■	第五章 晚唐社会、政治与诗歌风尚	(322)
	第一节 科举与唐季文士	(322)
一	为势家所把持的唐季科场	(322)
二	晚唐士人的科第遭遇与创作	(333)
	第二节 唐季士人的恋情和艳情世界	(357)
一	深婉动人的恋曲	(358)
二	沉迷于艳情世界	(367)
三	韩偓的《香奁集》:挚情和狎邪	(379)
	第三节 晚唐咏史诗与晚唐政治	(384)
一	咏史诗的界定	(385)
二	晚唐咏史怀古诗风的盛行	(388)
三	中晚唐史学风气与晚唐咏史诗的繁荣	(390)
四	中晚唐诗风转型与晚唐咏史诗的繁荣	(402)
五	晚唐文士的政治遭遇与咏史诗的政治视野	(409)
■	书目文献	(447)

绪 论

缪凤林辨别史与史书的关系说：“史书之描述，于事实纵极逼真，栩栩欲活，要为事实之摹本，非即事实之自体。真正之史，则非吾人所得而知。”^① 我们今人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前人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试图由这些残缺的历史文献，恢复古人的生活全貌，本身是行不通的。不过我们可以恢复部分生活的真实，或者追求一种结构上的真实。陈寅恪论云：“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② 试图“窥测其全部结构”成为不少学人的野心。本课题的研究亦然，欲尽量还原历史原貌，对晚唐政治与文学做出切实而深入的研究。

一 晚唐文学研究现状和本课题的着眼点

（一）晚唐文学研究现状及研究的难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丰硕成果。陈尚君、陶文鹏、陶敏、张明非、蒋寅、吴在庆、尚永亮和杜晓勤等专家、教授分别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文献研究、艺术研究、文学史料研究、

① 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 页。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79 页。

2 晚唐政治与文学

群体和时段研究、晚唐文学研究等专题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使我们得以一览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和现状。可以这样说,唐代文学的研究规模是很大的,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专家的功力是深厚的,唐代文学的园地经过无数学者的耕耘,几乎在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安插了他们的旗帜。后之从事研究者,首先要面对这些丰富的馈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说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累累,并不是说就没有了进一步开拓研究的可能性。相反,唐代研究比起其他的时代研究,有它独特的魅力。蒋寅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群体和时段研究》^①中引用了汤因比的看法,指出“唐代文学也正是一个最适合作文学史‘研究’的时代”:“按照汤因比的说法,研究对象数量的差异决定了人们处理材料的不同方式——历史、科学和艺术。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历史遗留物的多少决定了历史研究对待它的不同方式。资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详尽记录的考古方式;资料稍具规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综合、阐述的历史方式;资料过于丰富的近古,要么档案化,否则只能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艺术方式。唐代正是一个资料稍具而又不太丰富的时代,有限的史料,无边的空白,诸多线索,诸多悬念,为学者的考证、解释、建构历史叙述,提供了适度的条件。也许这就是唐史和唐代文学吸引最多学者的魅力所在……唐代正是一个最适于作历史‘研究’的时代。唐代文学也正是一个最适合作文学史‘研究’的时代。”

相对于盛唐和中唐文学来说,晚唐文学成就在后人的眼中很少得到推崇,南宋严羽提出“以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明代前后七子更是对晚唐诗不屑一顾,后代论者亦往往沿此等说法而轻视晚唐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唐诗研究者对晚唐文学的研究,相对于盛唐文学和中唐文学来说,则显得比较薄弱,虽然这种状况目前正在改善的过程中,但是综合性的专著还是不多见。除了小李杜、温庭筠、韦庄等著名作家关注的人多一点,其他中小作家多为人疏略,很多重要文学现象和事件没有经过认真的梳理,很多作家作品的潜在价值没有得到挖掘和发现,显然,这里还有很

^①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9页。

多路径可走，还有很多文学事实应该得到澄清，还有一些研究的空白点有待于补上。

那么，研究晚唐文学的难处表现在哪里呢？

1. “晚唐诗坛风气庞杂，门径纷歧，至今不能说理清了头绪。”^① 众多的诗人，杂乱的诗风，恰好是晚唐文学的特征之一，但是给研究者的研究带来不便，对原始诗歌材料和诗人行第的梳理和辨析将要花很多的气力。不过，当代唐诗学者如傅璇琮、陈尚君、陶敏、周祖谟、吴在庆、谭优学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奠定了深入和广泛研究的基础。

2. 唐末因社会动乱，使宣宗朝之后的史料多有遗失，且乖谬不少，同时，史家著述往往留有党争的色彩，这等有意的材料在运用时当细加辨别，以免堕入其局。傅璇琮在为李德裕撰年谱时对这一点体会甚深：“王安石曾指出有一种‘阴挟翰墨’，‘以覆其忿好之心’的人，利用执笔为史的机会，对前世‘雄奇俊烈’之士曲尽谤讪之能事，以致‘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答韶州张殿丞书》，《王文公集》卷八）……李德裕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在生前，处于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在他贬死以后，牛党文人，又多‘阴挟翰墨’，假造出许多情节，甚至伪撰李德裕的诗文，对他进行攻击，诬蔑。”^② 另外，大量晚唐历史琐闻笔记需要加以利用，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晚唐研究。瞿林东说：“从历史琐闻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也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即作史的意识，从而使它们提高了史学上的价值。”^③ 如李肇的《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佳话录》、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郑处海的《明皇杂录》、赵璘的《因话录》、李绰的《尚书故实》、张固的《幽闲鼓吹》、范摅的《云溪友议》、郑繁的《开天传信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还有晚唐的小说故事类笔记，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如陈寅恪先生以《顺宗实录》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中之“辛平公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乃关于此事幸存之史料，岂

①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中心 1996 年版。

②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序》，齐鲁书社 1984 年版，第 12 页。

③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 页。

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①

3. 如何把握晚唐社会在唐型社会向宋型社会的嬗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历史阶段性特点？如果对这种历史阶段性特点不能有相当的把握，对晚唐社会在社会形态交替之中起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不能作相当的关注，那么对于晚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阶段性的历史特征就不能做出客观的、合理的描述和分析。既要开对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中晚唐社会的本质特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又要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本身的特征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达到历史的还原和认识的高度。

研究中晚唐文学，不能不将之放在唐宋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研究，这样，就产生了很多很有意义和挑战性的问题。陈寅恪《论韩愈》云：“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艺术者亦莫不如此。”^② 陈寅恪的这种大历史观（即他所倡导的“通识”）对于文史研究者的启发是很大的。如果忽视了唐宋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和时代规定性，就会使自己的研究陷入漂浮无根的境地，因为研究对象本身是处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的。

4. 以文学而论，晚唐的诗歌创作无论是诗人的才情，还是诗歌的艺术成就，相对于盛唐、中唐呈现出一种衰落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说晚唐诗歌就一无可取，其中部分作家、部分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范文澜云：“从特出的诗人来看，李商隐不仅中唐末未有敌手，即列在盛唐也并无愧色。”^③ 同时，传奇、词正方兴未艾，而通俗文学如变文、俗赋、话本等在民间社会甚至上层社会都普遍流行，成为大众消费的流行文化。这种文体的盛衰起伏，群众审美接受趣味的变化，以及诗人审美情趣的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时尚和趣味的变化，以及文学各种体式消长，描述这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透视这个变动的动力和本质特征，本身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唐代文史研究者

①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8页。

的极大挑战。这就要求研究者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独到的历史观察力，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本课题的着眼点

晚唐文学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更少有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晚唐文学的内涵和特质进行史的勾勒。

目前，晚唐文学研究已经逐步打破了传统的以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格局（晚唐诗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几位著名诗人如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的研究之上），开始贯穿“史”的眼光，深入挖掘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专著。从晚唐诗歌研究的情况来看，如下各个方面的研究均有所突破和发展：1. 作家的生平考订与作品的编年（一些研究者对晚唐二三流文人生平资料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2. 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3. 诗歌类型的研究；4. 作家群体的研究；5. 对“转型”、“过渡”特性的研究^①。

但是总体上看，运用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即使仅仅从某个角度切入）的角度来全面考察晚唐文学，对晚唐文学的总体风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流变和地位做出系统的、独到的阐释，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相当欠缺的。而从政治的角度入手来透析晚唐一代文学，则更属少见。

一些专著和文章对晚唐的某个政治事件已经做出充分的研究。比如傅璇琮先生的《李德裕年谱》^②，全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经过、性质和是非曲直，对中晚唐文学研究甚有助益。然而由于专著性质的限制，对牛李党争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中晚唐文学，如何影响到文士的政治命运和文学创作，则尚未来得及展开。

还有一些专著和文章也有意识地从社会文化角度综论晚唐文学，但是晚唐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作为具体的文学现象阐释的后景甚至远景，被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地论及，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20世纪90年代，定位于唐末

^① 陶庆梅：《新时期晚唐诗歌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

文学研究的论文开始出现,如余恕诚的《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①、康萍的《唐末诗歌的淡泊情思及其原因》^②、吴在庆的《中晚唐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③、许总的《论唐末社会心理及诗风走向》^④等专著和文章。到了90年代后期,唐末文学的综合研究开始多有创获,其代表作是南京师范大学尹楚彬的1997年博士论文《唐末诗人群体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刘宁的同年博士论文《唐末诗歌研究》,前者对咸通以后各个诗人群体的人员和诗歌进行了考辨分析,后者对唐末文学现象做了深入系统的论述。二者的共同点是力求“史”的还原,将唐末作为唐诗向宋诗过渡的中介环节,研究这一时段在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具备这种宏深的眼光,他们得出的结论在许多方面都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不过,这些研究或偏重于文学,或偏重于政治,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研究也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政治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中晚唐文学,如何影响到文士的政治命运和文学创作的?

“晚唐政治与文学”这一选题的意义在于:1. 填补了唐代文学研究关于晚唐政治与文学这一课题的空白,有助于推动晚唐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2. 本书所创立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模式或许可以作为其他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同类课题研究的借鉴;3. 这是文学整体研究,即历史文化综合研究方法的又一次具体实践;4. 为唐宋文学转型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维、新角度。

二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之探讨

(一) 政治与文学之关系及中介之探寻

传统文学研究虽然十分注重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是这种研究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具体表现在:1. 在研究选题的取舍标准上过于注重作家作

① 《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③ 《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

④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品的思想价值，集中研究重要作家，而忽视了大量的二三流作家以及他们的更加直接反映时代风气的作品^①；2. 往往沿袭注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既定思路；3. 把社会政治变动直接与文学创作对应起来，认为文学像一面镜子一样直接反映社会历史现状，这是反映论的方法。从而，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汲取学界研究的成功经验，尽量避免这些研究的缺陷。

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召唤和应答的关系^②。张开焱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做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做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以是认同性的，也可以是对抗性的，还可以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姿态；可以这样界定“应答”：对一方召唤的任何回应都是应答，而不只是认同……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张开焱进一步从三个角度来论述政治与文学的这种召唤—应答关系：1.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具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关系，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走极端方式做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避，或者漠视，等等，而不一定是简单的认同（当然文学对政治也可以认同）。2. 从文学对政治的关系来看，文学也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做出应

① 该理论参见[美]阿瑟·O. 洛夫乔伊：《存在的大链条》，[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462页。

② 张开焱：《召唤—应答：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文艺报》1999年12月9日。

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熟视无睹。³ 政治对文学具有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

那么,政治和文学的这种召唤和应答是怎么发生的呢?既然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应通过一些中间的环节使二者召唤和应答的关系更加彰显出来。要认识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找到二者之间的中介将二者联结起来。余恕诚在《唐诗风貌·弁言》^①中提出了中介的寻找,“努力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探寻其中介,对社会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诗人的情感体验予以注意”。这种观念打破了传统的仅仅考察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既定思路,要求在宏观的社会背景(政治)与具体的文学现象之间用一些具体的环节将之联结起来。

必须注意到比起宋代文人来,晚唐文人与中枢政治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要疏远一些。这是因为晚唐大量的文人被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之外,执政的往往不是有名的文人,而稍有名声的文人往往科举不第或辗转于州县幕府,这与北宋文人,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既是参政的主体,又是文学的主体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与中唐文人也不同)。到了唐末,大量的文人与政治中心脱离的情况更加严重,政治录用的不公正和社会的不公平产生了大量的政治边缘人物。所以,必须面对这种历史事实,在阐述晚唐政治与文人的关系时,不能按照那种以中央政府里的政治活动与文人创作直接互动的模式来进行论述,必须作适当的角度的调整和方法的改进。

如何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中介将晚唐政治和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联系起来?如果仅仅以某些政治事件和以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考察核心,那么,会有大量的晚唐文人和他们的作品被排挤出我们的视野之外,这会使我们的考察局限于一隅,不能显示出一个立体感的晚唐政治和晚唐文人活动图。实际上,很多文人尽管被排挤出政治中枢活动,或者一辈子不得中举,但是他们还是或多或少地与政治发生关系,他们作为具有一定的儒教政治文化价值

^① 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观的文人都处在一种政治生活和政治氛围之中，从而在他们的诗文里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他们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感受；政治的变动和其他因素一起作用于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形成一定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使那些没有多少政治因素的艳情诗、游仙诗、咏物诗等，也不妨与他们以政治题材为主的诗歌作一个对照，看它们之间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互动性？艳情诗等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时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种社会时尚本身是产生于一个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的。

很多未能参与政治的文人，与他们来往的官僚都是处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的人物，这就使他们之间会产生一定的政治信息和政治感受的交流。如赵嘏、张祜虽未能中举，但是与他们来往的都是一些具有相当政治地位和政治经验的文人型官僚，这种社会交际行为本身也是文士的政治参与意识所使然。政治精英人物与政治边缘人物的交往和互动，在朝和在野的交流，有可能共享着一种政治文化，表达出一种共同的社会心态，同时这也是唐代崇尚诗歌的社会风气使然。

除了处在中央的文人士大夫与政治关系密切，很多晚唐文士更多的政治活动是在幕府中展开的。这就需要我们也应该考察一下处在幕府中的晚唐文人有哪些政治活动和政治体验？幕府生活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何影响？必须注意到，一些传奇志怪小说的创作往往是在幕府中展开的，有必要勾勒出这个文学事实和历史事实。

在研究时必须多方面地加以考虑，以凸显一个动态的立体的晚唐政治和晚唐文人图。当然，由于笔者精力和水平有限，可能到具体写作之时会将自己的笔墨主要放在一些政治事件之上。

（二）以文士的政治命运和政治文化为中介

本书将以中晚唐文士的政治命运和政治文化为中介，将政治、文人、文学三者联系起来，通过对政治与文学之间一些因素和环节的梳理，形成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理论。政治格局、社会力量的变化，通过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而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并塑造了这个时期文学艺

1. 以文人的政治命运为中介

所有的文士都生活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感受着现实的政治氛围。有些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有些人可能处于政治权力边缘，但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发生关系。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不能不作用于文士的身心，在其身上打上时代政治的烙印。当文士将这种政治遭遇、政治体验诉诸文字，以此来回应政治的召唤时，一种带有政治意味、政治内涵的文学作品就产生了。各类文学题材均“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走极端方式做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而不一定是简单的认同”。

重大政治事件对封建时代文人的影响从来都是很大的。晚唐时期的甘露之变、黄巢起义、唐室覆亡等重大政治事件都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

甘露之变相当酷烈，而反映甘露之变的诗文却相对缺乏，这使我们思考这起政治事件对士人心态转型的重大影响——从元和末、长庆初即加强的持禄苟安、明哲保身的观念经过这起事件得到了加强。而文人亦因其共同的政治命运，大多采取嗜哑的姿态——除了初出道的李商隐写了几篇斥责和针砭宦官的诗作，然而诗歌中蕴涵的沉郁、悲愤的情感和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

使我们推想这起政治事件对他的无题诗风格形成的影响。

黄巢起义以后，打破了朝廷和藩镇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各地军阀纷纷展开吞并斗争。

每一个士人都要面临着去取出处的选择，他们比此前更加尖锐地面对各种人生矛盾，处在人生抉择的两难境遇之中。虽然不乏忠心王室的士人，然而却出现了大批人格蜕变的士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无疑，要深入理解当时的诗人及其作品，必须对他们的政治命运和人生境遇有着“了解的同情”，然后对其诗歌的主题取向和创作旨意才有合理的阐释。

下面可比较一下两种题材的诗歌：隐逸诗和咏史诗。

由那些高蹈肥遁的隐逸诗人所作的隐逸诗表面看起来与政治丝毫无关，但是“逃逸”或“漠视”其实也是对政治的召唤的回应。比如方干、陆龟蒙均由于科第无望而选择隐居，然而由于各自的政治命运和价值取舍的不同，方干作品中却时露青云难上的嗟叹，陆龟蒙则为政治理想不得施展而时露怅惘之意。

而咏史诗的政治意味则更为显著，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因为对历史的反思和考察往往带着当代的政治视野和现实针对性，并非徒然而作，多数咏史诗人往往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

从而，政治成了我们观照一切诗作的不可或缺的维度，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认为，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声称：“文学作品的政治解释高于一切解释”，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水平”^①。

2. 以政治文化为中介

(1) 政治文化的定义

政治文化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书取狭义的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它的隐含前提是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7.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